

经济转型研究的新视点

——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

靳涛

内容提要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转型当作一个仅靠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就能解决的技术程序,这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思路导致了一些国家转型的受挫。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转型的认识。目前,包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都认识到,把经济转型的研究放在制度变迁和制度演进的框架下优于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的分析,而“中国模式”的转型进程也恰恰支持了这种观点。

关键词 经济转型 研究 共识 新视点

经济体制转型是经济理论界面临的一个大课题。转型的发生使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标准的价格与货币理论转向对产权和制度环境的研究。如何转型?通过什么方式转型?转型主要依靠政府来安排和推动,还是主要依靠市场?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不断反思的。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一套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这是因为,经济转型(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理论和产权理论,这些理论主要研究私有产权制度下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规律和效率,对于公有制如何转向私有制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所给出的结论只能是快速私有化和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而转型的复杂性往往令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不知所措。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就很清晰地将这个过程勾勒了出来。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之间达成的共识。该共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南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1989年,威廉

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1990年,他又把“华盛顿共识”归结为10个方面:平衡预算,严格控制预算赤字;优化公共开支;优化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提倡资本市场自由化;建立可变动的有竞争力的汇率体系;走贸易自由化之路;吸引外国投资;推进国有部门的私有化;政府放松管制;明晰产权并保护私有产权。在该“共识”的指导下,一系列以稳定货币和宏观经济,迅速放开物价和市场,加快汇率改革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加快私有化进程,改革法律体系、税收体系、金融体系和政府设置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快速推进。

“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过程中,由于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特点,在放开价格和市场以后出现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他们依据在南美洲对付

恶性通货膨胀的经验,以货币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可以较快并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这种观点的倡导者 Sachs 认为,许多经济自由化的关键步骤可以迅速实施,比如,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市场价格机制的确立以及实行私有产权等,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宏观经济的稳定也可以在稳定货币的情况下迅速实现(Sachs, 1989, 1990, 1992)。

根据“华盛顿共识”的原则,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试图通过稳定货币、放开市场和价格,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竞争的市场和富有活力的私有制经济。但这种转型的试验很快就被证明是有害的和灾难性的。在“共识”原则的转型试验中,俄罗斯和东欧一些转型国家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

“华盛顿共识”体现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逻辑。这里所说主流经济学家主要包括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和弗莱堡学派。他们大都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是,“华盛顿共识”对转型的指导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主要原因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上,这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oseph Stiglitz 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学家的一致意见(Stiglitz, 2001, 2004; Kornai, 2000, 2003)。

主流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型观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失效而正逐步受到人们的鄙弃。Roland 指出:“政策建议无论多么详尽,都不可能是在真空中做出的。”所以,转型研究必须以转型过程作为研究的起点。Roland 认为,转型中政府的作用、转型起点和转型方式的研究对更深入地认识转型非常有益(Roland, 2000)。

世界银行 1998 年关于东亚奇迹计划的讨论是对“华盛顿共识”认识的转折。这次研讨得出的结论是,东亚经济的惊人成就远非仅仅依赖宏观经济稳定或者私有化就能达到的,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产业制度和中小企业发展计划,这种奇迹是无法实现的。在“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入死胡同

的同时,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首先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的概念。他在一系列重要论著与演讲中批评不顾社会不满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走向“后华盛顿共识”(Stiglitz, 2001, 2004)。此后,美国经济学家 Narayan Ramachandran 提出,处于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应该以“三 G”政策取代“华盛顿共识”。他概括的“三 G”策略主要是指转型国家的可持续增长策略。在后来形成的“后华盛顿共识”中,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成为很重要的一条原则。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经济学家们在对“华盛顿共识”反思后得出了以下结论:转型中的稳定和有序是重要的;转型中竞争比私有化更重要;转型中的政府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转型必须重视市场制度的培育,等等。这样,他们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构成了“后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提高社会储蓄水平;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合理地进行税率改革;加强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监管;维持可浮动的竞争性汇率;加强市场制度建设;维护政府的权威;重视教育、文化和环境;强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等。

“后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中的国家应根据各国实际采取更切实可行的手段,同时强调,对转型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也应有长远的观点。它还认为,完善的市场体制是不可能短期建立的,对此要有持续发展的观点。我们的目标也应该更具体、更广泛,如提高生活标准,改善卫生、教育和环境,建立更有效的保障制度等,都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在转型中立足可持续发展是重要的。当然,这种发展必须是公正的发展,转型的成果不能只给少数人带来好处,建立一个民主和繁荣富裕的社会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

“后华盛顿共识”虽然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全面批评,也给出了转型国家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忠告,但对处于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而此时的中国转型

Roland,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0, p. 6

进程却不断吸引着主流经济学家的眼球。中国长达20余年的快速持续发展让世人瞩目。如,1978~199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1998~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平均在8%以上,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

2004年5月,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Jashua Cooper Ramo的论文《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提出了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此后,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正面肯定,就成了国际主流媒体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如,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在2004年5月20日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在2004年5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而墨西哥《每日报》在2004年5月24日刊登的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更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按照“华盛顿共识”的逻辑,中国的成功并不具有一般意义。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成功只是一个特例,如Sachs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开始改革进程的,而苏、东地区则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不仅存在转型问题,还同时存在发展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Martin认为,中国成功的因素取决于高储蓄、社会稳定、较好的利用外资、工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独特性;而Lardy则认为,中国的成功被夸大了,因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特别是就一些重要领域和方面的改革而言,所以,对中国成功的预言还为时尚早(Lardy,1998)。但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从对“中国模式”的怀疑到提出“北京共识”,西方主流学者肯定“中国模式”,并认为“中国模式”具有广泛借鉴的意义,这本身就说明了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试验中学习,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转型之路看起

来缺乏理论的支撑,但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哲学却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所以,“中国模式”的成功和“北京共识”的被世人接受就在情理之中了。其实,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演进主义分析方法都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的转型进程,因此,人们越来越重视用制度经济学、演进经济学理论来揭示和分析转型问题。

1. 用制度变迁的框架来研究经济转型。

过去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转型看成是可以以用宏观经济变量来衡量的技术性增长过程,这种看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现在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人们大都认为,转型应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如Roland就明确提出,从转型的进程来看,现在主流经济学关于转型的研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认为,“或许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结论更具价值”。主流经济学家对制度经济学在转型研究上的认可和承认,可以认为是对制度经济学“揭示一个真实的世界”的能力和研究方法的认可。当然,这也说明了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转型分析中是重要的。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和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转型(制度变迁)的方向,当一种社会制度演进到一定的阶段,总是受其既存的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因素的制约(North,1994,2001)。在转型过程中,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都不能忽视(North,1990)。另外,路径依赖条件下所产生的棘轮效应和蝴蝶效应都会明显地表现出来(Roland,2000)。从一些转型国家的转型进程来看,制度分析框架还是能较好地反映转型进程的实际的。

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度的社会革命,而不是一个仅靠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就能解决的技术程序(Stiglitz,2001,2004)。转型

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Structural Factor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994(18).

Martin Raiser, "Lessons for from Whom?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in China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cs Transformation*, vol 7, No. 2, 1995

N. R.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for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8

Roland,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erfac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0

不是一般的制度变迁,而是一种重要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变,是社会经济体制所涉及的一系列制度的整体变迁。转型中各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都会对转型策略的实施产生影响,另外,转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市场制度的缺失和不规范都对转型结果产生直接影响(Kornai, 2000; North, 2001)。市场经济中制度安排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并不是通过一次和几次简单的“宏观革命”就能达到的,它是一个缓慢的制度变迁过程(Kornai, 2000)。从目前来看,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许多理念都对现代经济理论做了有益的补充,这些理念不仅增强了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转型的理解,而且也使他们在经济分析中更加重视市场的培育和政府的作用。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进,标志着对经济转型的研究正处在不断发展和深化之中。

2 用演进博弈的框架来研究经济转型。

2002年3月27日,哥伦比亚大学的Nelson教授在中国所作的题为《演化经济学的前沿》的报告中,介绍了演化经济学目前所关注的两个前沿问题:一是如何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问题,即如何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二是如何面对制度研究方面所遇到的新挑战。

从中国的转型经验来看,学习、选择、试错和模仿的过程,可以看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其实就是一种制度演化的过程。中国经济转型的演化没有明确的蓝图,也没有精确的设计,而是在不断试错和学习中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经验和演进主义分析框架的耦合,使人们相信用演进主义的框架来分析和看待转型是适合的和有效的。

从目前对制度演进的研究来看,Aoki无疑是集大成者。他认为,在现实经济社会里,还存在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如日本式、美国式、法国式、英国式等。如何理解这种制度的多样性?转轨国家应转向哪种市场经济模式?一个国家中各种制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制度的起源和性质是什么?制度如何改变或为何不可改变?制度如何演化?如何理解博弈论的多重均衡性?他在比较制度分析中提出了用演

进的思想来看待转型和变迁问题。他在用博弈论进行制度分析时,按对博弈主体假定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不同,把博弈模型分为古典博弈模型和进化博弈模型。他认为,古典博弈模型适合于分析规范、合同和治理结构之类的可自我实施性问题,而进化博弈模型则适合于分析以惯例和习俗形式体现的制度自我实施性问题(2001)。这两种模型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在一些情况下,两者甚至在同一域导致相同的模型解(即制度)。Aoki的思想明显受到了Andrew Schotter, Binmore和Young H. P.等学者的影响,但从对转型的研究和进展来看,毫无疑问,他是用制度演进和进化博弈分析框架研究转型现实问题的领军人物。

Aoki Avner Greif, Young H. P.等学者在用博弈论研究制度演进问题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他们构建的很多模型和研究框架都给制度变迁和演进的深入研究指出了方向(Aoki, 1995, 2001; Greif, 2001; Young, 1996)。他们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如Aoki所说的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统, Greif所言的制度是重复博弈均衡的结果,都表达了大致相近的思想,那就是制度演进是各级主体之间博弈关系所达到的重复均衡结果。当然这个均衡与主流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一般均衡还是有区别的。

从North后期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以及Aoki等人的研究来看,把制度变迁和演进放在一个演进均衡的框架下会比直接在主流完全理性基础框架下通过一般均衡和制度供需均衡进行分析,要有效得多。有关转型中制度演进和进化博弈的研究远没有结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去探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5BJL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靳涛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信欣